

約翰·拉貝（上）

——一九三七年南京市民的活菩薩

郭石城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日本佔據南京，殘殺南京市民，一位名叫約翰·拉貝的德國人聯絡留在城裡的少數英、美籍人士成立中立的國際安全區，拯救了廿多萬難民的生命。隨著時間的消逝，這段歷史已經被人們漸漸淡忘。九十年代末期，封塵已久的拉貝日記重現，而且隨後又有幾部電影表彰他的義行，因此中國大陸人民知道他的人越來越多。相反地，在我們台灣卻很少人與聞其人其事，由於筆者在九十年代末期即關注此事，而且自覺有義務為文介紹他的生平事蹟，尤其是在這個中日兩國風雲再起的時節。本文分上、下兩篇，上篇介紹他的生平事蹟，下篇討論因為拉貝而引發的相關問題。現在就讓拉貝帶領我們重新走一趟那段黯淡的歲月，一起來探討歷史真相。

一、南京市民心中的活菩薩

約翰·拉貝（John Rabe）於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廿三日出生在漢堡，幼年喪父，家境清寒，中學未畢業就離開了學校，先在漢堡一家出口商行工作，然後轉往非洲一家英國商行，在那裏練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語。一九〇八年他來到了中國，先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時間，一九一一年被西門子公司羅致，一九三一年開始擔任西門子駐南京辦事處經理。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南京地區設置電話系統，為發電廠安裝渦輪機，並為醫院提供醫療

設備，由西門子培訓的中國專業技術2人負責設備的保養和維修。

拉貝長期在國外生活，對德國政治了解有限。一九三四年他在私人所有的土地上蓋了一所德國學校，為了方便向德國政府申請經費和教師，他加入南京地區的國社黨。就像當年一般德國人一樣，拉貝對剛上台不久的希特勒充滿了期待，對他上台不久就取得經濟、外交和軍事上的成就也滿懷敬意。不過他對希特勒與日本結盟卻憂慮滿腹，正如同在中國的大部份德國人和軍事顧問一樣，他希望德國與中國維持友好的關係。

拉貝在中國的生活一向平靜，他平易近人、幽默風趣，在南京的外國人圈子裡是一個很受歡迎的人物。他有記日記的習慣，由日記可以知道他對政治沒有太大的興趣，不過對中西文化的差異和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卻觀察入微，也有不少記載。拉貝很滿意目前的工作，如果不是日本人發動戰爭，很可能就這樣在中國終其一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日軍佔領南京，改變了他的命運。在日本進兵南京之前，日本空軍已開始轟炸，駐南京的外交使節及外國僑民、中華民國政府的機構及人員，以及有能力離開的南京市民都陸續撤離，只有貧苦大眾及老弱婦孺約一百萬人留在城裡。在惶恐無依的情況下，他們開始尋找避難所。由於日本和德國結盟，因此不少市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到拉貝這裡來避難。拉貝在中國已經生活了大半輩子，與西門子華籍員

工及當地居民已經建立了濃厚的感情，何況他本來就是一位極有正義感的人，因此他敞開了住家大門，在短短的時間內他的住宅及在五百平方公尺的後院臨時搭建的帳篷裡就住滿了數百名難民。

拉貝知道長此以往絕非良策，因此與留在城裡的少數幾位外籍友人商量決定成立一個國際安全委員會（Internationales Sicherheitskomitee）處理難民事務。這個委員會於十一月廿四日正式成立，最初有十餘位委員，中間有幾位陸續離開，最後只剩下十位成員。論國籍：五位美國人、三位德國人、二位英國人。論職業：三位是金陵大學教員、二位是傳教士、一位醫生、其他都是商人。由於拉貝平常就廣結人緣，再加上德國與日本已經結盟，將來與日本人交涉有許多方便，因此一致推舉他為主席。拉貝隨即向西門子公司上海總部報告，總部很快的回電表示，不同意他的舉措，並責令他為了公司的利益趕快離開南京轉往漢口。拉貝早就預料到總部會有此反應，因此很冷靜的回電表示，他不能丟下中國員工不管，而且基於人道應該協助中國難民，等到適當時機，他會遵照公司的指示轉往漢口。

拉貝的決定相當勇敢而且冒險，他知道此舉一定會引起公司的不快，影響自己的前途，而且他也明白這項任務非常艱鉅。南京眼看就將淪陷，政府機構已經撤退，公務早已停擺，交通癱瘓、水電停滯，秩序已經沒有辦法維持，人民的生命與財產毫無保障，民眾更擔心的是日軍進城後會不會採取報復行動，這些都是國際安全委員會必須面對的問題。但是，情勢逼人，拉貝已經沒有太多時間考慮，只有鼓起勇氣承擔責任。

首先委員會必須劃定安全區取得中立的地位，而且必須先徵求中、日兩方同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長蔣介石在獲悉委員會的計畫之後馬上同意，並撥款十萬元給委員會應急，南京衛戍

司令唐生智、南京市長、警察局長也表示尊重安全區的中立性。由於日本人不可置可否，拉貝急電希特勒請求協助，他原以為希特勒一定會基於人道出面交涉，結果讓他大失所望，他沒有獲得任何回音。德國大使館早已遷往漢口，沒有人可以商量，也得不到任何支援，他只好走一步算一步。

可是安全區的工作千頭萬緒，安全區非軍事化的維持：日常支出經費的籌措；安全區通道的警衛；前線退下傷兵的照料；糧食、運輸、燃料、帳篷、電力、電話、飲水的供應；衛生設備的安裝；垃圾排泄物的清除；醫療站的設立等等，這些工作極為繁瑣，不過，在他的領導及其他委員的同心協力和中國政府的支援下，大致都能順利解決。

日本人的空襲越來越頻繁，為了避免安全區被轟炸，腦筋動得快的難民用床單縫製了一幅巨大的布料，上面繪製納粹的「卍」字形標誌，讓日本飛行員識別這裡是國際安全區，可能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安全區從未被轟炸過。不過，當日軍逼近南京，開始砲擊的時候，安全區就飽受威脅，所幸並未重大傷害。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日本軍隊進城後，到處劫財物，並以慘無人道的方式殺害中國平民、姦淫婦女，國際安全委員會委員之一的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John Magee）偷拍了不少影片，這些影片都是他後來在南京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作證時的最大鐵證。拉貝在日記上數度描寫日本士兵如何強行闖進安全區搜捕青壯年男子或企圖強姦婦女、洗劫財物，他數度列舉事實，向日本大使館提出抗議，這些抗議照也成為審判戰犯時的有力證據。

國際安全委員會一位美籍委員指出：安全區秩序維持及工作的順利推展應歸功於三位德籍委員，除拉貝外，另外兩位是克勒格爾（Krischan

Kröger)及施佩爾林(Eduard Sperling)。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經常看到他們手無寸鐵，只憑大衣袖子上掛著的「卍」字形納粹標誌，一面大聲斥責那些到處搶劫或企圖強姦婦女的日本士兵，一面用德語高呼「希特勒萬歲」、「德國人」就把那些日本士兵嚇跑。

上海的報紙以及英、美等國的媒體都詳細報導了國際安全委員會的活動，並盛讚拉貝等人的義行。德國的媒體顯然是遵照德國政府的指示，沒有任何報導，因此在德國幾乎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一九三八年年初，西門子上海總部勒令拉貝結束南京分處的業務，拉貝不得不遣散中國員工，並遵照總部的指示回上海報到。雖然最惡劣的情況已經過去，難民們都不希望他就此離去，婦女們跪在地上叩頭，哭求他留下。難民們製作了一幅巨大的布條，稱他為「活菩薩」。國際安全委員會的其他委員們也聯名請求上海總部准許拉貝留在南京，並表示安全委員會需要他，這些努力都告徒然，一九三八年二月廿三日拉貝不得不告別南京，前往上海。

抵達上海的時候，拉貝受到當地居民熱烈歡迎，他在當天的日記上有下列一段記載：「人人都視我為英雄，讓我感到很難為情，我還不習慣被人當作英雄看待。」可是，上海總部的上司們的態度卻截然不同，他們對拉貝違反指令逗留南京一事仍舊耿耿於懷，以上海總部沒有適當的位置為由，將他調回柏林總公司。

二、柏林的社會邊緣人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拉貝抵達柏林，德國外交部次長兼國社黨海外黨部負責人博勒(Ernst Wilhelm Bohle)特別安排時間接見，並頒發紅

十字勳章，這是德國駐中國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應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的請求向德國外交部申請的。國民政府自己頒發給拉貝的勳章稍晚才送達。能夠獲得這些勳章使他覺得非常安慰，也引以為傲，不過，他是一個低調的人，從不張揚，新聞媒體沒有報導，外界也沒有人知道這些事。

西門子總公司並非不知道拉貝見義勇為的事蹟，只是在商言商，也許他們認為拉貝沒有遵照上海總部的指令前往漢口是不忠於職守的行為；也許因為總公司領導階層一向重視學歷，而拉貝中學還沒有畢業，總之，公司安排拉貝的是一份最基層的事務甚至於可說是打雜的工作。對一個為西門子公司奉獻近卅年，而且是重要地區的經理，業績優良的拉貝來說，真是情何以堪！不過，他對公司並沒有太多怨言，他在日記上自怨自艾說自己是一個「倒楣鬼」。

雖然工作不稱心，他沒有忘記應該做的事，他作了一系列演講，報告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並放映約翰·馬吉偷拍的紀錄片。甚至於在黨衛軍的一次集會上作了一次報告，他將講稿呈報給希特勒，並希望能親自向他報告日本人的罪行。結果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不但不能見到元首，反而招致幾位秘密警察登門調查，沒收了牠的講稿和影片，並拘提他到秘密警察總部去審問，還好秘密警察當局認為他只是基於人道，同情受害的中國人，一時迷失了政治方向，僅僅規定他今後不得再公開宣揚日本人的罪行，沒收的日記也在不久之後發還，拉貝從此噤聲。

一九三九年九月世界大戰爆發，拉貝的主要工作是負責與在阿富汗和印度被俘的西門子公司員工聯絡，或者讓他作些翻譯工作，直到戰爭結束。一九四五年蘇聯紅軍攻佔柏林，拉貝因為是納粹黨員因而被捕，後來由於體弱又患有糖尿

病，不久即被釋放。一度失業在家，後來有一個英軍機構聘請他做口譯工作，只做了幾天也因為納粹黨員的緣故被解雇。西門子公司則是因為他還沒有通過去納粹化的審查而不敢雇用。

原來德國戰敗後，戰勝國為了肅清納粹餘孽，規定凡是與納粹有關的人都必須經過一定的審查程序才能就業，這段審查過程使他深感沮喪，因為他第一次審查就被打回票，主要的原因是他曾經代理過南京地區黨部負責人的職務。他過去在南京的確也曾經跟旁人說過這件事，他也不想否認，可是，事實上那只是因為黨部負責人出外度假委由他短期代理，在黨部的檔案資料裡沒有任何紀錄。因此他不服，向盟國肅清納粹法庭提出復議，還好這次復議法庭通過了他的審查，法庭的判決書這樣寫著：「雖然他在南京曾經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但是他是因為在南京設立的德國學校有必要獲得德意志帝國的支持，才加入該黨。拉貝臨時擔任該黨南京地方組織負責人是因為當時在中國的德國人並不了解國社黨的罪惡目的和犯罪行徑……拉貝在美國人和英國人的請求下擔任南京安全區委員會主席，使安全區避免了日本人的轟炸……以上有證人的證詞可以證實……鑒於以上所述，委員會經過多數票通過，支持認定其為非納粹份子的提議。」

這份判決書使他如釋重負，在去納粹化審查過程中所受到的無情指責，使他身心受創。由下面一段日記的記載可以看出他當時的心情：「如果我當年在中國知道納粹後來會犯下殘酷的罪行，我絕不會加入國社黨。如果我的思想與言行與英國人和美國人相左，他們也不會選我為國際安全委員會的主席。一個被數十萬人視為活菩薩的人，在這裡卻被視為『賤民』、『被社會遺棄的邊緣人』，現在我只好靠著懷念過去才能活下去了！」

除了精神的折磨外，拉貝全家就像其他千千萬萬德國人一樣過著飢寒交迫的日子。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四日的日記如此記載：「妻子多拉只剩下四十公斤重，我們兩人都瘦得不成人形。夏天即將過去，今年冬天怎麼過呢？我們到那裏去找暖氣材料、食物和工作呢？」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記載則是：「明天是耶穌受難日，我們的心情就像耶穌受難一樣，我們飢餓難當……」

三、遙遠中國傳來的溫情

正在這個時候，遙遠的中國傳來了呼喚約翰·拉貝的聲音。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上海「中國每日論壇報」登載一則消息說：南京市長沈怡正在尋找在日本人血洗南京之際曾經拯救數十萬南京市民的德國友人約翰·拉貝。同一消息也報導國際安全委員會的美籍委員也在打聽他的下落，而且盼望他重回中國安度晚年。數天後一位名叫胡梅爾（A. Hummel）的讀者投書提供消息說約翰·拉貝目前在柏林的西門子公司總部工作。沈怡市長獲得消息後，馬上去函聯絡。同一時間我國駐德軍事代表也按址找到拉貝，瞭解拉貝的情況後，馬上提供日常用品及食物。一九四八前三月蔣介石夫人宋美齡也致函拉貝表示：南京市民將永遠記得他在日本佔領南京最黑暗時刻的英雄事蹟，並囑咐他與中華民國軍事代表團的黃將軍聯繫，他一定會提供最好的協助。當年與拉貝一起奮鬥的美國傳教士密爾斯（Rev. W. P. Mills）的妻子也從南京寄來一份包裹。

由於拉貝的日記只寫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為止，當這一波一波溫情傳來的時候，我們無從獲知他內心的感受。不過，我們清清楚楚地記得，當他抵達柏林的時候，西門子公司如何冷落他；祕密警察如何騷擾他；在接受去納粹化審判

過程中那些審查他的德國同胞如何折磨他。當德國同胞視他為社會邊緣人的時候，遠方的中國人民與國際友人還記得他，景仰他！這是何等鮮明的對照！拉貝自己在日記上曾提到唯有緬懷過去才能療傷止痛，這些來自遠方溫馨的友情想必給予他不少慰藉，陪伴他度過人生最後的幾年。

一九四七年拉貝年滿六十五歲，正式從西門子公司退休，由於退休金不多，偶爾還去西門子公司做些零碎的臨時工作，以補家用。一九五〇年元月五日中午時分，拉貝在公司工作中時中風。晚上即告不治。家人將他葬在柏林威廉大帝紀念公墓，參加葬禮的只有家人和少數幾位友人。

拉貝逝世已經六十多年，他和中國的關係仍舊綿延不斷。拉貝身後留下八大本日記，由於過去在政治上沾惹到許多麻煩，家人一直視這些日記為禁忌，從不觸碰，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才在前德國駐中國大使維克特（Erwin Wickert）鼓勵下，交由維克特整理於一九九七年出版，就在同一時間有兩位中國人對拉貝日記在美國聲名遠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其中一位是筆者台大法律系及海德堡大學的學長邵子平，另一位則是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其中經過，筆者將在下篇詳加敘述。

拉貝逝世四十多年後因為墓地佔地期限將到，家人與中國政府多次接洽後，於一九九七年將墓碑交給中國，保存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二〇〇五年八月十三日中國大陸留學生及旅德華人在拉貝孫子，海德堡大學教授湯瑪斯·拉貝（Thomas Rabe）住宅後院豎立拉貝半身銅像，表達他們的感念。

二〇〇六年拉貝的南京故居，在西門子公司、南京大學及德國政府的支持下修繕完畢，於十一月一日正式對外開放，其正式名稱是：「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或「拉貝和平與衝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

二〇〇九年中國大陸導演陸川執導的影片「南京！南京！」以及德國名導演加倫貝格（Florian Gallenberger）執導的「約翰·拉貝」先後在中國大陸各大城市放映，估計有數千萬人觀賞，引起大陸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廣泛的討論，拉貝在中國大陸尤其是在南京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拉貝雖然已逝世六十多年，他仍然活在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心中。

（本文作者為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曾任僑選立法委員，現旅居德國）

「當代法國研究論文獎助金」得獎訊息

本會102年度「當代法國研究論文獎助金」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研究所黃曉柔同學獲獎，其論文題目為「法國藝術國際傳播協會推廣當代藝術策略之研究」，研究「法國藝術國際傳播協會(ADIAF)」發展沿革，找出其核心目標與領導人物意欲發言法國精神的理念，再藉由其與當代藝術關係的論述以及傳播理論，觀察此協會如何推廣法國當代藝術，期望本研究的結果與發現，能夠作為台灣藝術推廣者在進行藝術傳播策略規劃時的參照。